

1939年2月,日军侵入海南,并逐渐地占据了海南岛沿海的地区,这些地区就是抗战中所说的沦陷地区。在这些地区,日军在政治上采取的是高压政策,在经济上是垄断的掠夺政策,在文化上是殖民下的奴化教育。因此不堪奴役的人们,被迫开始流亡的生涯。

在当时,逃离沦陷区的逃亡去向,有两个选择,其一是向海南岛内的山区逃亡,也是当时抗日军民的撤退方向;其二是流亡到岛外,是为了有可能维系原有的生活。我们主要谈岛外的避难或逃亡的情况。

# 抗战期间流亡岛外的海南人

文本刊特约撰稿 张兴吉

## 日军登陆： 海口市市民向乡下避难

当时海南岛的政府、军队的军政人员都是向海南岛腹地的山区撤退,这一时期,各地的学校,主要是中学,也随着政府撤退。但与政府关联不大的社会人员,在日军登陆之时,处境是很艰难的。其中一些人,都参加过抗日的活动,他们为防止日军的报复,选择逃亡,例如海南书局经理的唐品三。此外,最感困惑的是商业人士,也包括农业资本家,他们担心的是自己的财产与企业的安危。

日军登陆之初,就开始强行征用了民间的设施,海口的五层楼、侨安旅店、大同旅社,海口博爱路的海南书局旧有的房屋及设备等等都被日

了海口,但没有造成任何的损害,飞机也没有丢炸弹,于是大家又开始返回。我们也一度逃出去了,之后又回来躲在家里。当听到外面有人要打开锁头,门板也要被打坏的时候,惊慌地从后门逃走了。主人因病卧床,比我们逃得早,也不知道他现在哪里。”

## 日军进驻： 强占企业商人纷纷外逃

如果说日军进城,使海口市市民有所恐慌,这种恐惧还只是暂时的,而令当时的海口商家、市民恐惧的是,他们的生活一下子改变了。

日本人海南岛“开发”计划的实施中,对海南更多的企业构成了威胁,首先是海南岛的对外贸易,在最初阶段虽然还没有被管制,但是进



与海南岛一水之隔的广州湾(今湛江)曾经是法国的租界地,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度是海南人的避风港。

军强征为军事机构;日军进入海口,造成了很大的恐慌。市民们最初的反应是无所适从,因担心日军的轰炸以及入城后的劫掠,最初的选择是外出避难,先到附近的乡村避难。

《海南岛记》中说:日军进城时,“虽然还有零零星星的一些小店铺在营业,但大街上的大部分商店都已经关了门,并放下了铁闸门,门上都挂着巨大的锁头。”“市内的商人听说日本军队要来,从昨天凌晨五点就开始逃难了,中国军队从八点开始撤退”。

在海南书局,随日军入城的记者火野苇平询问了店员,店员说:“昨天七、八点左右,听说海口湾来了日本军舰,于是街道上的店铺都关了门,大家开始向乡下避难。不过,后来又听说日本军队虽然进入

出口的口岸以及海关是日本人控制的,就现实说,海南岛的贸易也是在管制下的,有资料记载:海口的物资只能从日本企业购入,再进行销售,因而海口等城市的商业,迅速凋敝也就是必然的了。所以,在此后,海南向岛外的逃难人数开始逐渐增加。

其次,日本商业企业随日军的进驻海南,并借助军方的力量开始吞并海南的企业。上面说过,海口知名的建筑物(商铺)为日军强占,作为军事机构,如大亚酒店,被日军征用,改名为海南岛酒店,作为日本官方的接待酒店。也有日本企业强迫转让原有的建筑。

再次,农业企业方面,日本的开发企业与日本军方联合,占有海南的农场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在日军侵入海南岛后不久,海南的商人开



钟衍林



唐品三

始了逃亡的过程。

随侵琼日军一起来到海南的日本农业会社,急于获得土地,在这个过程中,日本农业会社在各地农场的土地很多是暴力手段获得。如在海口的台湾拓殖第一苗圃,它坐落在海口港栈桥的近处,作为台湾拓殖株式会社海南岛开发试验场之一,在日军侵入海南岛不久,即1939年4月29日正式设立。该苗圃原属一南洋华侨所有,有5町步(约合75亩),日文资料称:“转让给”台湾拓殖,台湾拓殖又将之扩大到15町步(约合225亩)。又如大日本制糖在那大的橡胶园,原来的主人是当地的天任公司,日军侵占海南岛后,这个橡胶园即为大日本制糖进行“管理”。实际上,这些农场的所有者,在日军到来前,都已经逃难了,日军与日本公司,则趁机抢占。其实,即使这些所有者不离开农场,日本人也会使用同样的手段抢占。

## 流亡去向： 上海租界、香港、 南洋、广州湾

在岛外逃亡的目的地上,大致有四个去向,第一是上海的租界;第二是香港;第三是南洋;第四是广州湾(今天的湛江)。其人数也是按上述的顺序。前往上海租界的人最少,因其路程遥远,生活成本过高,来此避难的,主要是原来就在上海有商业活动的人物,例如经营米谷的永生号老板陈礼运;其次是香港,因与海南相近,前往避难者较多;南洋是海南华侨的聚居地之一,但是日军控制了海南岛沿海后,前往南洋更加困难;避难者最多的是广州湾。

在日军侵占广州后,因广州湾当时是法国人的租借地,暂时不受日本人的侵扰,所以这里一时间聚集了来自于日军侵占地区的逃亡者,不仅是广东内部,还有来自于上海、浙江等地的商人。1939年后,这里聚集了大量的海南难民,当时总部在香港的琼崖华侨总会还派专门人员前往慰问,在那里设立了三个难民区,专门安置海南的难民。

流亡的人们中,有不少是抗战爆发之初在海南抗日活动中比较活跃的人物。

如海南书局经理唐品三。唐品三在1930年是海口市商会常务委员、1937年担任商会主席。据其子唐南椿先生回忆,唐品三是1939年2月10日当天早晨通过电话得知日军已经登陆海南岛的确切消息后,开始逃亡,先到下洋村的一座寺庙里过了一夜,第二天天没亮便赶到海口东边的东营港,找朋友雇了小帆船逃往了广州湾。2月10日当天,唐品三的妻子带着几个孩子躲进了海口的法国教堂(大同路上,当时叫黑袍教路,今天的泰龙城是其旧址)。几天后的17日,唐品三的妻子和妻弟两个人来到书局,对已经强占海南书局(日军作为《海南

迅报》的编辑部)的占领军提出带走一些家里的生活用品的要求。当时日本人很想通过他们找到唐品三。日军军官久门少佐和才田大尉通过胜间田义久(胜间田善作之子)久居海口的日本商人翻译,与他们进行了交谈,对他们说:“海南书局的财产本可以作为敌产没收的,但是如果态度有所转变,书局也可以归还给你们,而且你们还可以成为已经发行的《海南迅报》的经营者,当老板”。力图引诱唐品三的家人说出唐品三的下落,并逼迫唐品三与日本人合作。殊不知,此时的唐品三,已经远在海北的广州湾。

不堪受奴役的人们中,还有一些文化人和教育家。

陈铭章,1901年生,笔名天尔、白苗(解放后用),日军侵入海南前,任《国光日报》编辑,日军侵入海口十余日后,逃到广州湾,又转赴香港,抗战胜利后回海口,在《世纪晚报》任知识副刊主编。解放后在《海南日报》工作。

陈铭章在香港谋生,不忘沦陷的故乡,他自费出版了《琼崖散忆》、《琼崖歌谣》。来寄托自己的思乡之情。《琼崖散忆》收录作者写于香港的十四篇文章,都是作者的忧思之作。其中有“故乡之恋”、“海口—我的家乡”、“我的藏书”、“海口古迹”、“一个成仁的友人”、“关于五指山的诗”、“漫话文昌”、“琼崖黎人的婚俗”、“苏东坡在儋耳”、“我与海国社”、“采歌回忆”、“琼崖的儿歌”、“三年了”等文章。

1938年10月,广州沦陷后,海南形势日益危急,琼海中学校长钟衍林赴港,将学校的重要图书、仪器迁到香港,创办琼海中学香港分校,附设小学,继续推行战时教育,灌输抗日的爱国思想。琼海中学香港分校最初在青山租借房屋授课,此后又迁到九龙新界元朗,后再迁到跑马地。1941年冬,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,香港形势危急,港校收容海南籍流落香港的同乡,合计原有师生百余人。香港沦陷,分校停办,师生再次冒险回到内地,在韶关等处继续授课,此后,因形势恶劣,最后解体。

海南最早的学校——琼崖师范学校(琼台书院)为躲战乱,在日军侵入海口、府城后,迁往琼山东山镇苍苑村等地办学,此后师生分头逃难,乘坐帆船、渔船前往广州湾。到达广州湾的海南教育界人士集会相议,以琼崖师范为主要力量,联合海南其他学校重组一所中学,称为“琼崖联合中学”。借用庙宇祠堂充当教室宿舍,因陋就简挂牌开学。聘请琼籍教师任教,招收海南籍子女就读。不久,还在当时广东省的临时省会——韶关设立粤北分校。韶关的环境条件,同样困难重重。1943年2月广州湾也被日本人占领,学校又迁到化县宝岙,此后韶关形势紧张,要紧急疏散,粤北分校也急忙迁往广东的信宜县城,一直坚持到了抗战胜利。🇨🇳